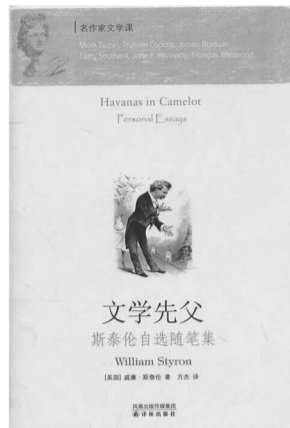


删人快语



「美」威廉·斯泰伦著
《文学先父》
译林出版社
方杰译

重读威廉·斯泰伦

□蒯乐昊

威廉·斯泰伦写下《文学先父》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指的是马克·吐温，但当威廉·斯泰伦的这批自选随笔以《文学先父》之名集结出版的时候，“文学先父”似乎也隐喻了斯泰伦本人在美国文坛的地位。

立足美国这个历史不到300年的国家，谈“文学先父”似乎要容易得多。马克·吐温比斯泰伦早了约100年，但他们所面临的生活背景与重大议题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以至于斯泰伦在追忆这位文学先父的时候，他不断发现自己与马克·吐温的内在联系，并为这种巧合而感到惊奇：他们教养经历类似，都背负着阴沉沉的种族主义负担，作为白人男孩，他们的心灵都曾留下过奴隶制的烙印。马克·吐温的家族曾经是奴隶主，到了斯泰伦的年代，情况早已有所不同，但斯泰伦的祖母也曾拥有奴隶。斯泰伦与黑人孩童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带着马克·吐温时代的影子。

“所有的黑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我们与那些同龄者实际上还是同志，”马克·吐温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我们是同志，然而又不是同志；肤色和身份在我们之间插入一条双方都能意识到的微妙的线，从而使彻底的融合变得不可能。”跟马克·吐温一样，斯泰伦后来选择住在“北方佬”中间，他们分别写出了与奴隶制有关的书，《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纳特·特纳的自白》，无论是马克·吐温还是斯泰伦，都因为奴隶制的书取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声名与读者，因为他们本质上讲述了相似的东西，而那东西便是美国最为深刻的困窘：种族的痛苦。

作为二战之后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威廉·斯泰伦身上的“南方属性”是一望可知的，他描写黑奴反叛的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艺术学院颁发的豪威尔斯奖。《苏菲的选择》更是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改编电影亦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大奖，被认为是“西方小说史上里程碑作品”，斯泰伦把苏菲这一非犹太女性角色，放置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中心，正是希望超越种族与国别，写出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普遍灾难——历史、道德、悲剧性的激情，是理解斯泰伦乃至其书写中“美国性”的关键，美式自由背后是束缚的隐痛，是“粗野者和清教徒的抱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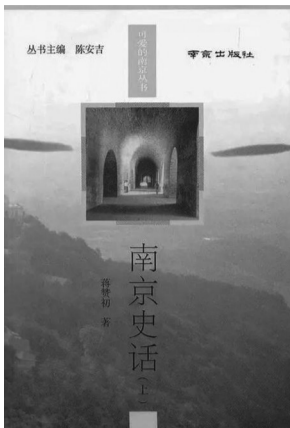
经历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笨拙岁月”后，斯泰伦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宾，他受邀参加白宫社交聚会，在那里见识了总是手持哈瓦那雪茄的约翰·肯尼迪和他光彩照人的妻子杰姬，那是一场向诺贝尔奖获得者表达敬意的国宴，施莱辛格、古德温、塞林格，正在声名鹊起的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总统在被招待之列，所有人都陶醉在甜香槟和雪茄的香气里。“人们也许会认为，安排这场诺贝尔晚宴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这个芬芳四溢的高潮，我只有在巴黎的饭店里才吸进过如此令人愉悦的香气。”过于陶醉的斯泰伦一屁股躺进现场的摇椅里摇个不停，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肯尼迪的专座，总统因为背部功能失常，只能坐在那样的摇椅中。

他与肯尼迪的再一次会面，是在总统的豪华观光游艇上，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八月天，他们进行了一场漂浮在海面上的颠簸午宴。交谈很快从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到南方腹地愈发紧张的种族局势，再到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暴力事件，斯泰伦趁机向总统普及了自己的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他告诉肯尼迪，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弗吉尼亚奴隶起义的领袖，肯尼迪马上有了警觉，他要求知道关于暴力的更多信息，斯泰伦发现肯尼迪沉浸在种族问题的苦恼中，而他此前对奴隶制并不了解。

交谈过程中，总统发给斯泰伦一支哈瓦那雪茄，作家没有舍得抽，他趁肯尼迪不注意，把珍贵的雪茄偷偷藏进了口袋里。——当时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禁运，雪茄当然在禁运之列，禁运令便是由这位嗜好哈瓦那雪茄的总统本人亲自下达的。

在那一刻，斯泰伦产生了某种奇特的悲哀感，他意识到，肯尼迪与卡斯特罗，两位政治家其实有着相似的气质。

他没有悲哀太久，那一年年底，肯尼迪遇刺，在达拉斯死去。作为纪念，斯泰伦抽掉了那支私藏的雪茄。



南京出版社
蒋赞初著
《南京史话》

虎踞龙盘今胜昔

□陆远

史学名宿蒋赞初先生以近百岁高龄辞世，南京城里的老辈学人又弱一个，悲怅之余，又想到蒋先生的代表作《南京史话》，想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定位与社会责任。

蒋先生本以考古学上的成就名世，他的学生贺云翱教授等人在总结乃师的学术贡献时，就列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帝王陵考古发掘、六朝考古调查发掘、陶瓷考古等种种大端。不过其著作流布最广，在社会公众中间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南京史话》——我的母亲是改革开放后南京第一批职业导游，将近40年前，刚上小学的我就是从她口中第一次知道了“蒋赞初”。那个时候，南京的文旅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第一套规范的南京历史文化的解说词，就是以《南京史话》为最重要的蓝本和参考书。

今天我们读到的20多万字的《南京史话》，其前身是蒋先生于196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南京史话》，属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说到这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就不得不提到整整90年前，历史学家张荫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这位时年不到30岁的年轻学者，深感历史教育对提升国民基本素养、建设富强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国史课本的编撰是大家公认的急需。”但他更强调，“目前似乎没有一个史家敢自信能独立担任此事”，因为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历史知识，而且需要通俗（尤其是对青年的通俗）的文章技巧”。张荫麟呼吁史学界能集合众力，挑起这副重担。他也邀请同道青年学友集体编撰一部高水平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由其本人负责先秦至汉，杨联陞负责汉至唐初，吴晗负责唐至明清，千家驹负责鸦片战争以后。尽管这项计划最终因为日寇入侵而告中断，张荫麟本人也在战争中英年早逝，但这段经历对吴晗影响深远。20年后，他以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建议为中小生编写一套可以作为课外阅读的历史普及读物，这就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缘起。吴晗不仅亲自担任主编，还邀请了尹达、白寿彝、任继愈、余冠英、何兹全、周一良、邵循正、侯仁之、郑天挺、翁独健、柴德赓、傅乐焕等30余位学界名家担任编委，在20世纪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史上，这份名单堪称真正的大家云集，空前绝后。到1966年，这套丛书已出版了150多种，累计印数超过900万册，成为几代人了解祖国悠久历史与伟大文明最基本的普及读物，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套名副其实的“公共历史”作品。

蒋赞初那时是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刚过而立之年，在校长郭影秋推荐下接受了编写任务。这本小册子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全书不过12000字）准确勾勒了南京城市变迁的历史线索，初步呈现了“十朝都会”的基本面貌。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南京史话》的修订版，篇幅扩充了近一倍，在保持“面向大众的通俗普及历史读物”定位的前提下，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提出了一些前人没有的观点，例如宋代王安石围玄武湖造田，直到元末才重新恢复。与此同时，蒋先生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将《南京史话》扩写为16万字的专书，大大提升了其史学专业程度，尤其突出六朝和明代两个历史阶段，并第一次对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城市规划和建筑遗产做了初步梳理，实际上奠定了今天我们对南京历史文化认知和叙事的基本格局，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江苏各市编写“史话”系列的范本。1995年，蒋赞初先生再次将全书扩充至20余万字，收入“可爱的南京丛书”，也是先生生前最后的定本。

《南京史话》充分体现了“大家写小书”的学术风格和写作特点，也就是张荫麟先生说的“深厚的历史知识”加上“通俗的文章技巧”。比如第一章“从‘龙蟠虎踞’说起”，概述南京的地理形势，蒋先生简明扼要地将南京地区主要的山岗丘陵、河流湖泊结合重要史实一一做了介绍，印证孙中山先生“南京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的观点。其文辞之雅驯优美，对读者来说也不啻一种享受。

更重要的是，从这本数量甚巨的作品中，我读到的是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淑世情怀。上世纪50年代吴晗专门撰文，批评那种“认为只有写专门论文、专门著作才是学者，才是专家。至于写普及知识的小册子，那是低人一等的”的错误观点，他为“历史小丛书”设定的读者对象是小学六年级以上的学生和摘了文盲帽子认得两千字左右的工人农民，蒋赞初先生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最为普通读者写作，也是继承了这种“把知识普及给人民”的信念。今天，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可我们依然需要新时代的蒋赞初和“大家小书”。

远见近拾



中信出版集团
王一力著
《倦怠社会》

韩炳哲读当代人

□房伟

新世纪之后，对于当代人类社会的解读，一直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任务。韩炳哲是近些年引起广泛国际影响的当代哲学家，他是韩裔德国籍，出生于首尔，先后在欧洲多所大学任教。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海德格尔”，然而，韩炳哲的研究之中，我们能看到福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鲍德里亚等很多哲学家的影子，他的研究领域跨越伦理、社会学、现象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媒介等范围。在前人的基础上，他提出“功绩主体”“抑郁”“倦怠社会”等哲学概念，试图全面理解当代社会变化。

有评论家认为，韩炳哲兼具浪漫气质和德国理性批判精神，其内在精神诉求具有“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目前，韩炳哲已经出版了十余本哲学著作，这些作品之中，2010年出版的《倦怠社会》（国内由中信出版社引进）无疑是理解韩炳哲的一个重要重要突破口。

韩炳哲的著作都不是很长，文风类似鲍德里亚，既有理性反思，又有感性的表达，他经常在题记引用文学著作，比较适合文科生口味。《倦怠社会》分为“精神暴力、超越规训社会、深度无聊、积极生活、观看的教育”等几个小节，韩炳哲采取的是问题式症候研究法。他在每一个小章节、都分析一个当下社会精神症候。要理解韩炳哲和这本书，“功绩主体”是一个关键词。本书的前言，借助“受难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引导出当代社会的隐喻特征，即“功绩主体”，意思是说，社会失去“否定性”力量，所有的社会影响都倾向于“肯定性”，将主体塑造成一个不断超越、不断进步的功绩性形象。

韩炳哲认为，福柯的规训社会由医院、疯人院、监狱、营房和工厂构成，当下社会则由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购物中心和基因实验室构成。21世纪不是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这种“超级现代性”发展思维，导致主体自身对自身施加暴力，除了要求不断征用外在资源，而且不断对自身剥削，形成“过量自我肯定”的消极状态——现代抑郁症。韩炳哲称之为“梗阻病”。这种过度积极，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过度刺激和碎片化，也丧失了沉思能力，造成焦虑和歇斯底里症，社会逐渐增长的积极性还削弱了一些情感，比如恐惧和悲伤。由功绩主体的症候，韩炳哲也引导出“倦怠社会”本意，即过度积极的狂热，导致的社会“倦怠”症，一种孤独的倦怠。

可以说，韩炳哲的观点是对福柯以来形成的“社会规训”思维的反思，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启发。当下社会的确表现出对工作和生产“歇斯底里”的过度积极状态。这种状态蔓延到各行各业，不断加码各种繁杂事物。而通过网络，这种现象更多地被暴露、被放大。比如，直播网红们为博流量，不惜暴饮暴食，戕害自我。网络作家们在“日更一万字”的诱惑下，以超越极限的方式过度活跃，投入文学创作，在数千万字网络文学长度中，形成对故事和人物的“过度消费”。在高科技冷酷“算法”的算计下，一些人疲于奔命……

更令人警醒的是，过度活跃带来的内卷，即使在医疗条件提高的今天，仍旧造成很多身体和心理问题（例如全球范围内猝死和抑郁症比例的上升）。这些过度投入，不仅是在权力规训下完成的，而且是以功绩性肯定的心理诱导下完成的——金钱奖励和正面形象的赞赏，同样造就学习狂、论文狂、工作狂、直播狂……

我们现在常常呼吁慢生活，让内卷化社会慢下来，让生活变成慢节奏享受，而现实之中，除了少数财富自由的人，大多数人只能将这句话当成安慰人的“鸡汤”。由此而言，韩炳哲的这本《倦怠社会》，有助于我们真正从理性层面，认识社会病症的症候，更好地规划我们的人生。

伟言达义